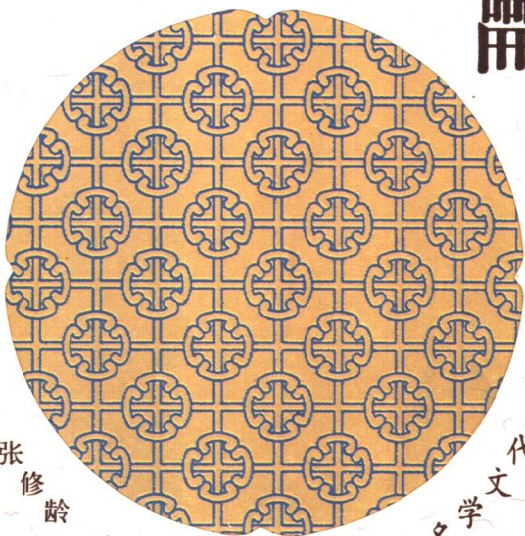


留取世间真道德
看人扼腕献奇方

翁同龢

集选



马卫中

张修龄

选注

近代

文学

名家

诗文集

诗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翁同龢选集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马卫中 张修龄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翁同龢选集/翁同龢著;马卫中、张修龄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ISBN 7-02-003568-X

I. 翁… II. ①翁…②马…③张… III. ①翁同龢-选集②诗文-作品选集-中国-晚清
IV. I21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6952 号

责任编辑:宋红 装帧设计:翁涌
责任校对:宋红 责任印制:周小溪

翁同龢选集

Weng Tong He Xuan Ji

马卫中 张修龄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568-X/I·2718

定价 16.00 元

隔着新世纪的门槛往回看

——写在“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前面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带着难以忘却的创痛、带着取得成就的喜悦、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走进了二十一世纪。

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之初的1900年，英、法、德、意、美、俄、日、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一百年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今天，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今天，做一番百年回首，看看蹒跚于二十世纪之门的中国，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之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先给中国人送来了资本主义。当大清国那一直闭锁的破败国门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为现代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所震惊。意识到：此夷狄非彼夷狄，“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财利，其隐赆流溢

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之矣，又莫测其所以然”（严复《原强》，《选集》第25页、31页）。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洋和学习西洋成功维新变法的东洋，希望从那里找到变法图强的良方，因为当时的局面正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所说：

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

然而东西方社会、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拿来”也变得不是那么唾手可得。正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以至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上文）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东西方文化间的交融是怎样一种化合的过程。当时的“体用之辩”，即具体反映了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当新科学、新学科引进中国之后，则大大激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思想界之活跃，实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在火光血影中写成的中国近代文学，记录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蜕变的阵痛；记录了一百年前中国人艰难跨入二十世纪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中国人为民族前途和命运所做出的探索和牺牲。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民族的神经，往往能提前感知时代的风云际

会。而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则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优良传统。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该让自己“硬”起来、“强”起来的时候了。回顾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做一番抚今追昔的反思，便是我们编辑“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的初衷。

丛书原拟为十种，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定为目前的七种，一次推出。即：

《龚自珍选集》(孙钦善选注)

《康有为选集》(舒芜、陈迩冬、王利器选注)

《梁启超选集》(王遽常选注)

《严复选集》(周振甫选注)

《林则徐选集》(杨国桢选注)

《翁同龢选集》(马卫中、张修龄选注)

《秋瑾选集》(郭延礼选注)

其中前四种为我社原有出版物的改版重排，后三种为新书。

所以使用重排本，以其为之做注者都是学界知名人士，可以说是“名家”注“名家”。虽注释体例有不尽规范之处，所下断语亦难免带有时代烙印，然释作品背景之周详、注历史典事之精到，则是后来人很难逾越的。加之选注工作被当今学界视为小道，或根本不算科研成果；或在计算成果时大打折扣，致使当今要找到笔下“应有尽有”和“应无尽无”的新注家非常不易。

重排中，我们对旧注本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一、删除“落后”、“反动”等游离于正文之外的空泛政治性结论；二、改正个别不确切的僻字注音和语词注义；三、改正注释中的引文差误；四、

改正原书排校错误；五、与新注本求得大致相同的体例。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旧注本的以下两种情况未做处理：一、征引史料多为撮述，虽加引号，但并非严格引文者，如《梁启超选集》即属此类情况；二、对所注出典有不同见解者，如《严复选集·三月三日……游万生园》：“何曾三起继三眠，却笑万生成万死。”注〔11〕曰：“三起三眠：《三辅故事》：‘汉苑有柳，状如人，号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细味之，三起三眠似当指蚕眠，而非柳眠，即《本草》所谓“蚕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也就是蚕由初生到成蛹的时间。若“一日”之内而“万生成万死”，何乃太速耶？然在做注者已归道山的情况下，此类问题不宜强加于人，故一仍其旧。

鉴于当今注释人才之难得，我们尤其应该感谢为丛书之新选题担当选注工作的几位先生，特别是杨国桢先生。为丛书做注时，杨先生的女儿病情危重；注稿完成之日，正女儿撒手尘寰之时。杨先生在《林则徐选集》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女儿深深的歉疚和思念，于此我们亦向杨先生和他已故的女儿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请相信，一个青春女孩的生命正以书卷形式在我们中间延续着，我们希望杨先生因此而得到安慰。

有研究表明：1840年前后，中国在上世界上还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远超德、法、俄等国。当年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武器落后，并不是火炮射程够不着人家，也不是我们的军费投入不够。据史料记载，甲午海战时的北洋水师在舰船吨位、航速、火力等方面与日本海军或是相差无几，或是互有优劣。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

的优长,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之最,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无如此规模的装甲防护。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我方均占优势,只有中口径火炮,日本稍稍领先。总起来看,双方实力大体相当,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然而,北洋水师惨遭失败,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舰未沉!人们不禁要问: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答案很清楚: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廷腐败无能,军队素质低下。这就是为什么英军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虎门炮台,却能让整个大清政府屈服的原因。如今,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

中国人的强国梦做了一百年了,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翁同龢说:“留取世间真道德,看人扼腕献奇方。”(《小游仙》)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秋瑾说:“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梁启超说:“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在。……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少年中国说》)

与一百年前相比,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没有理由悲观;但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人家却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与当年的那八个国家相比,我们更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

百年来，国歌中的这句话其实不止一次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响起。我们没有时间走弯路、更没有时间走回头路了！好在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为我们勾画了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蓝图，“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葆有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性格，不忘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汉唐精神，“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谋发展，中国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温故而知新，便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现代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3.8.

前 言

—

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 1830 年 5 月 19 日，在北京石驸马街罗圈胡同寓所，翁心存第三个儿子诞生了。尽管翁心存以后作为同治帝师，曾经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但是，与他这位取名翁同龢的儿子相比，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却要稍逊一筹。

翁家在江苏常熟是望族，除了父亲翁心存之外，翁同龢的两位哥哥，在晚清政坛，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哥翁同书，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咸丰间佐江北大营军事，官至安徽巡抚；二哥翁同龢，咸丰间由荫生官兵部主事，同治间累擢湖北巡抚，光绪元年（1875）兼署湖广总督。在翁心存之前，翁家虽然在明清时期也曾辉煌过：万历年间翁蕙祥弟兄五人，四位中了举人，其中二位还成了进士；从顺治三年（1646）到康熙十六年（1677）短短的三十年中，曾出现了翁长庸、翁叔元等六位进士。但是，此后翁家中落了。经过了许多年的艰辛和沉寂之后，翁同龢祖父翁咸封终于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考中举人。以后又选授海州学正。尽管在封建时代，学正不是什么大官，但是，这为其子孙执着于科举之路提供了便利和信心，似乎昭示着翁家门第的复兴和光大。

翁同龢出生的前一年，即道光九年（1829），翁心存作为翰林

院编修，奉旨入直上书房，授读惠郡王绵愉。这是翁家与清皇族建立私谊的开始。翁家的发达，与此不无关系。同时，从道光五年（1825）至道光十五年（1835）的短短十年内，翁心存曾四次被选派为乡试考官，这使得翁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了极大的改观。翁同龢从小就不再需要像父兄那样，去过“豆屑杂麸皮”、“全家食糠覈”（《咏菜糊涂》）的艰难日子。当孙家鼐以菜糊涂见贻时，翁同龢即以“菜糊涂”为题作诗吟咏，并在诗序中动情写道：“江淮间屑麦和菜入釜调之，曰菜糊涂，先祖在海州时举家所常食者，同龢熟其名而未知其味……追忆八十年旧事，感叹不已。”翁同龢踏上了与祖辈不同的生活道路。

翁同龢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自道光十年（1830）到咸丰五年（1855），少年苦修举子学业，是他踏入仕途的准备时期；自咸丰六年（1856）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胸怀抱负辅助君主，是他驰骋仕途的有为时期；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光绪三十年（1904），开缺回籍隐居乡里，是他退出仕途的失意时期。

翁同龢出生在北京，但他的启蒙岁月，是在故乡常熟度过的。道光十四年（1834）秋天，五岁的翁同龢随祖母张太夫人，首次回到常熟。由于母亲生他时已是四十一岁，因此，幼时的翁同龢在身体方面显得先天不足。翁同书之子翁曾纯只比他这位叔叔小四个月，为了祈祷翁同龢的平安成长，大人便以曾纯的口吻为之取名“叔平”，由于母亲无乳，全靠瓶盛汤米喂养长大，故又名“瓶生”，以后翁同龢以“平居士”自署，便缘于此。

在回到常熟后的第二年，翁同龢便遵照父命择师入塾。三年后，翁心存奏请回籍告养母亲。返回常熟的翁心存应聘主讲常熟著名的游文书院，翁同龢也因此入游文书院，在父亲的亲自督责下读书学习。很快，他习完了《四书》、《五经》，以及《史记》、《资治通鉴》等封建社会既是启蒙教材、又是科举敲门砖的著作，

十三岁开始,学作试帖诗和八股文。从此走上了科举之途。

到了晚清的道咸年间,科举的发展已到极致。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入木三分的描述,绝不是无中生有的杜撰。翁同龢在父兄催促下走上的这条艰辛之路,比起那些无果的士子,确是大幸了。自十六岁应苏州府试成为秀才后,除了两次应金陵乡试不第外,翁同龢继咸丰二年(1852)顺天乡试中式,参加咸丰六年(1856)会试,列殿试一甲一名,状元及第。这对当时深受“学优登仕”影响的分子而言,是一种极度的荣耀,也是以后仕途发展至为重要的资本。那时的翁同龢,刚刚二十七岁,便被授翰林院修撰,而只有状元,才能授予这样的官职。

当然,翁同龢步入官场并非始于状元及第后。道光三十年(1850),在通过了礼部拔贡考试后,他被分发刑部江西司行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京官。日后,翁同龢作为刑部右侍郎平反昭雪杨乃武冤案而声名大噪,他早年在刑部的这段经历,肯定是起了作用的。此外,翁同龢耳濡目染父兄在官场的所作所为,也学到了许多从政的经验。而翁同龢高中状元,使他的仕途起点,就比其他要高。更何况,还有翁心存、翁同书等在朝中多加关照。

在涉足政坛的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有几件事情对翁同龢是影响至深的。首先,同治四年(1865)子承父业,翁同龢奉旨入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皇帝。此前,翁心存曾授读过惠郡王绵愉、恭亲王奕訢、锺郡王奕诘,特别是同治元年(1862)奉命入弘德殿行走,先于翁同龢成为同治帝傅。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倡导尊师,倚仗翁心存与皇室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翁氏家族在晚清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咸丰十年(1860),当权倾一时的怡亲王载垣、户部尚书肃顺借“五字号金融丑闻”一案,“排斥打击翁心存,罗织罪名,‘必欲致之狱’”的时候,咸丰帝

“深察无他”，仅处以革职留用（见谢俊美《翁同龢传》附《生平大事年表》）。同治即位后，慈禧即联合奕訢，诛灭载垣、肃顺等，并为“五字号”案株连者平反。又同治元年（1862），身为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在寿州被苗沛霖攻陷后，曾国藩以其“办理寿州事件失当”严辞参劾，由于曾国藩重兵在握，又肩负着剿灭太平军、中兴清皇朝的重任，因此，部议以失守罪名抵死系狱。此时，慈禧出面，先是让翁同书之子翁曾源高中同治二年（1863）状元，以后又将翁同书改戍新疆，而行至太原又接旨赴甘肃都兴阿军营效力。既沐浩荡皇恩，翁同龢也就忠心耿耿。继授读同治皇帝之后，翁同龢又于光绪二年（1876）奉懿旨往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皇帝。可见慈禧在当时对他十分信任。而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由此建立的师生关系，却影响了他在以后政治斗争中的态度及命运。

其次，光绪元年（1875）坚持复查杨乃武一案。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轰动一时，至今家喻户晓。其中，身为刑部右侍郎的翁同龢，也是此案重要角色。在接到慈禧“反复研求，尽速核复”的懿旨后，翁同龢便仔细审阅了全部案宗，并调查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和知情者。在以后的刑部堂会上，他率先列举了此案的许多疑点，并与主张维持原奏的刑部尚书桑春荣展开了激烈争辩。最终，翁同龢的意见占了上风，堂会决定“驳令再审”，这就为“杨案”的翻案走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记云：“闻主此驳者全出翁侍郎同龢力，与尚书桑春荣争而得之。”由于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任刑部主稿，正好承接杨乃武案的复审工作，因此，翁同龢对案情的关注和熟悉，都超乎寻常。每当两宫太后召见，他都会以此案进况陈奏，引起了慈禧对杨乃武一案的极大兴趣。慈禧亲自提审此案的全部人犯，又听取翁同龢意见，在光绪三年（1877）对涉案遭冤人员全部平反昭雪，并对冤案的承办人员分别给予处分。翁同龢在复审此案

过程中展示了处理复杂政事的才华，也赢得了极大声誉。两年后，翁同龢入阁，首先担任的职务就是刑部尚书，这与他因此案而得慈禧信任不无关系。

再次，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态度。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开战时，翁同龢已是一品大员的户部尚书。此前，有关中日对朝鲜事务的争端，李鸿章主张以外交的方式通过磋商解决。但是，日本咄咄逼人的势态，以及中国舆论对此施加的压力，让亲政多年的光绪皇帝深感不安。他将自己深为信赖的师傅翁同龢任命为军机大臣，让他参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重大事件的决策处理。在军机会议上，翁同龢力排众议，主张“添兵朝鲜，调东三省及旅顺兵”，作好战斗准备，同时，他也不主张放弃外交努力：“既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彼如仍请派员与议，则倭人所请各条，如有不妥，我可议驳；如果有裨政务，亦可由我饬行。”（见故宫博物院编《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翁同龢之所以强硬主战，首先基于慈禧和光绪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的主战立场。《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十四日记：“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次日又记：“至上书房，臣入奏昨日事，大致添兵仍准讲解。上曰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又曰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既然如此，翁同龢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因此迅速建立威望，担起主持国政的重任。他明确向光绪表示，自己要“佐少主，张国威”。当时，军机处把会议内容整理成奏折，翁同龢名列联衔之首，其主战态度和中坚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中日开衅的后果，却与主战阵营的初衷南辕北辙。

事实上，就晚清国力而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谈到甲午战争的结果时，面对“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条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

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的惨痛结局，总结其原因道：“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或许这话正指出了翁同龢以及他所效忠的清王朝的悲剧命运所在。

在翁同龢的一生中，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维新变法。史学界对翁同龢之所以有很高的评价，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在维新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翁同龢……力图改革，拒降主战，变法维新，反映了仁人志士们为了拯救国家危亡而在荆棘布满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奋斗行进。”（戴逸《翁同龢传·序言》）甲午战争失败，导致对战争失败责任的追究，其政治上的直接后果，是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加深。同时，围绕维新和守旧的治国大政方略，也在统治者内部产生了极大分歧。这种矛盾和分歧，引发了空前激烈的权力之争。翁同龢作为光绪帝师和朝廷重臣，始终处在政治斗争的中心而无法回避。当甲午战争正酣之时，恰逢慈禧六十大寿，户部被逼须支付大笔经费。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因经费的捉襟见肘，对慈禧此举感到非常为难。他向光绪作了汇报，又联合户部其他堂官联衔陈奏，希望能够压缩庆典活动的规模，以减轻筹款的压力。此举得到了光绪的支持，但遭致了慈禧的强烈不满，她马上采取报复措施，将光绪宠爱的珍、瑾二妃降为贵人，甚至要下令撤消毓庆宫书房，以减少翁同龢与光绪的联系。只是由于光绪的反对，又经奕訢的调停，毓庆宫书房才暂时得以保留。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与顽固派都想通过实现各自的政治纲领，来夺取最高权力；也可以说他们都想通过控制朝廷，来达到

各自的政治目的。他们分别亲近和拉拢光绪及慈禧，使宫廷内部的斗争，更趋白热化。翁同龢感念与光绪朝夕相处的师生情谊，出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忠君思想，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光绪一边，成了帝党魁首。《马关条约》签署时北京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举子们名为反对和议，实质是要求变法，他们和主战的光绪、翁同龢结成了政治联盟。在以后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较量中，光绪和翁同龢选择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新党，而康、梁新党也选择了光绪和翁同龢。

由于《翁同龢日记》在戊戌政变以后作了删改，有关康有为与翁同龢交往的记载，已和实际情况有了很大的出入。我们根据其他史料得知，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康有为就几次想拜见翁同龢，并想通过翁同龢代递《上清帝书》。但翁同龢当时无意与康有为接触。甚至康有为在甲午会试落榜后，经南海同乡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疏通求见，翁同龢在应允后又临时变卦。张荫桓很为不解，翁同龢解释道：“此天下奇才也，吾无以位置之，是以不敢见。”（见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翁、康不相交通的局面在甲午战争后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光绪二十一年（1895）会试，康有为以二甲四十六名中式。据说翁同龢在阅卷时有意让康有为高中榜首，只是由于李鸿章等横加阻挠才未能得逞。实际情况是，此次会试后不久，翁同龢就放下架子，于五月二十三日亲赴粤东会馆访晤康有为，因康有为外出未遇。但康得知后即于当日回访，《康有为自编年谱》对这次会晤作了详尽的记录：“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时未知上之无权，面责常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常熟乃谓：‘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

实无权,太后勤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吾乃知宫中事。”翁、康见面的第二天,翁同龢就将此事禀告光绪,在翁同龢的鼓动下,光绪逐步倾向维新,并把康、梁等新党作为自己依靠的政治势力。

帝党和新党,通过翁同龢和康有为的结合走到了一起,中国近代维新变法运动,从此拉开了大幕。翁同龢首先让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意旨。鉴于后党势力强大、立场顽固,翁同龢曾指望由恭亲王奕訢来实施新政。但奕訢并不支持新政,翁同龢与康有为最早提出的改革纲领和措施,就此流产。戊戌政变以后,许多史料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我们已无法知晓这十二道新政的具体内容。从《康有为自编年谱》中,我们得知首先是变科举,由状元出身的翁同龢来改革科举,或许是有说服力的。而透过《翁同龢日记》,也可以在字里行间窥出其它一些新政措施,如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练新军等。有些改革举措,由于翁同龢和康、梁新党的努力,还是得到了部分的推行。当然,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无疑延缓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的进程。

维新派的改革思路,一有组织,二重舆论。他们成立强学会,壮大改革派阵营,还拒绝李鸿章入会;同时办《强学报》,鼓吹变法,不断加强宣传力度。这样,朝野结合,上下呼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后党和顽固派的神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他们对此又惧又恨。新、旧之争,帝、后之争,也就日趋激烈。事实上,维新运动并没有朝着维新人士的既定目标深入发展下去,这场运动达到高潮之时,也已预示着谢幕之日的来临。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改革方案,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著名的“百日维新”